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2年5月2日 (第259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陆克文：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并非不可避免

所有战争都是可规避的，而避免中美战争最好的方式是加深对彼此战略思想的理解，构建一个无论中美如何相互威慑，也能竞争性共存的世界。如果未来十年世界能保持和平，政治环境可能会发生变化，政治领导人在面临生死攸关的全球挑战时将形成合作优先而非冲突优先的思维。

中美关系

美学者建言华盛顿的对台政策

美国《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杂志网站 4 月 20 日登载了塔夫茨大学国际关系青年研究者塞缪尔·加德纳-伯德(Samuel Gardner-Bird) 的文章称, 美国应尽可能避免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文章摘要如下:

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利益不对称。对中国而言, 台湾问题即内政问题, 是国家统一的核心, 但台湾对美国而言并不涉及重大利益。中国大陆收复台湾并不会对美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制度造成威胁。对于台湾问题如何解决, 中国大陆将在权衡了各种利害关系后做出最终决策。这就意味着若需采取军事手段, 哪怕面临冲突可能升级的风险, 大陆也不会轻言放弃。相比之下, 华盛顿并没有底气断言它愿意加入其中。

美国国内有不少议员和战略家呼吁采取鹰派政策来“保卫”台湾地区。然而, 尽管美国人大体上支持“保卫”台湾, 但民调显示他们并不愿意在潜在的军事冲突中做出牺牲。在持久战中, 损失会远远超出美国人愿意容忍的伤亡人数, 强硬政策最终会失去民心。美国不应“抛弃”台湾, 但切忌夸大台湾的重要性, 不要用“捍卫自由”等情绪化诉求模糊对战略的清醒判断。

事实上, 美国多年的参与导致台北习惯于“搭便车”, 对此, 美国必须鼓励台湾为自身的防务承担更多责任, 发展非对称防御。在武器方面, 美国应该向台湾提供更廉价、更有效的反舰导弹、水雷和无人机以保证台湾获得一定的空军和海军优势。此外, 在潜在的军事冲突中, 台湾应该实施“豪猪战略”, 拖延大陆的收复计划, 使美国有时间争取盟友支持, 开展协调一致的制裁行动。

中国的新阿富汗政策削弱了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美国《外交家》(The Diplomat) 杂志网站 4 月 13 日登载了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分析师赞恩·佐卡克 (Zane Zovak) 的文章称, 中国与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的潜在合作意愿不利于美国巩固和发挥在中东的影响力, 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后不久, 其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 (Zabihullah Mujahid) 就公开表示中国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近期, 中国接待了塔利班成员以“响应”这份热情, 双方讨论了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和安全问题。中国与塔利班临时政府接触有两个主要目标, 希望后者能够: 1) 保证减轻活跃在中国边境的极端组织所构成的威胁; 2) 保护中方在阿富汗既有的, 以及计划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的投资项目。

中塔双方的合作意愿, 以及国际社会上关于敦促美国归还阿富汗被冻结资产的呼声均不利于美国继续执行既有的制裁措施。尽管美国无法阻止中塔合作, 但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抵消中国在阿富汗增长的影响力。

首先, 美国应加强多边合作机制, 尤其是与印度之间的合作。虽然印度一向不愿充当美国在南亚制衡中国的力量, 但防止巴基斯坦和中国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

其次, 美国应积极为阿富汗制定政治替代方案, 全力支持阿富汗国内以及散居国外的非塔利班民间社会组织、企业和媒体。

最后, 拜登政府还应考虑将塔利班列入“外国恐怖组织”(FTO) 名单。早在小布什政府时期, 塔利班已被列为“全球恐怖主义实体”(SDGT) 名单, 以限制其进入美国金融体系, 而 FTO 的限制则更严厉。拜登政府至今拒绝将塔利班列入 FTO 名单是担心此举会阻碍华盛顿和喀布尔之间的谈判。鉴于塔利班持续拒绝国际社会的改革呼声, 白宫应该重新考虑这一选项。

CNAS: 美应合理利用防御工具开展对华贸易和技术竞争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网站4月14日登载了该机构高级研究员兼能源、经济和安全项目主任艾米丽·基尔克莱斯（Emily Kilcrease）的文章，分析了中国所谓“非市场化”创新行为，并为拜登政府提出了相关建议。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本土技术的发展对美国在全球的创新领导地位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中美地缘政治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此类竞争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了直接影响。对美国而言，一个有效管理中美经济和技术竞争的战略，将高度依赖以国家安全为重点的防御工具。良好的国家安全工具应该具有可预测性，对国家安全风险有界限分明的划分，并能获得私营部门的认可。基于此，文章为美国在对华贸易和科技竞争中能够使用的安全工具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美国出口管制部门的执行力。国会应要求新任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领导者根据既往法案自上而下评估新兴和基础技术部门，并向国会报告结果；

第二、设立监管对外投资的新机构。为填补美国在技术转让方面的空白，国会应该授权设立一套新的具有针对性的对外投资管制机制，与出口管制部门共同监管那些流入中国，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技术资本；

第三、加强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的合作。委员会应该制定超越传统目标的出口管制措施，利用各国在对俄实施制裁时的高度一致，为对华采取更强有力的管制措施积聚势头，委员会还应该制定共同的风险识别方法和解决方案，以应对中国“滥用”监管机构的做法；

第四、建立多边投资和出口管制的新制度。美国应启动外交进程，与盟友合作建立一个在军民两用领域接替《瓦森纳协议》的新多边制度。制度目标应包括促进成员国共同安全，保护人权

和民主制度，防止破坏稳定的常规武器或新兴武器在全球范围的扩散等。此外，美国应建立公开统计数据库，根据出口管制分类编号绘制贸易和投资流量图，并鼓励伙伴国采取同样措施。

陆克文：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并非不可避免

所有战争都是可规避的，而避免中美战争最好的方式是加深对彼此战略思想的理解，构建一个无论中美如何相互威慑，也能竞争性共存的世界。如果未来十年世界能保持和平，政治环境可能会发生变化，政治领导人在面临生死攸关的全球挑战时将形成合作优先而非冲突优先的思维。

近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卫报》（The Guardian）网站登载文章称，中美两国间的冲突并非不可管控。文章摘要如下：

尽管中美两国在未来十年间不太可能发生武装冲突，但凡事没有绝对。中美两国间的力量平衡正迅速变化，中国的宏观战略从防御转变为积极姿态，美国也采取了以“战略竞争”为核心的对华政策，上述种种正推动两国走向“碰撞”的道路。然而，中美注定一战的论调十分危险，当这种话语占据上风，两国就会加剧对彼此的妖魔化，公共政策回应也会从预防战争转向准备战争。

所有战争都是可规避的，而避免中美战争最好的方式是加深对彼此战略思想的理解，构建一个无论中美如何相互威慑，也能竞争性共存的世界。如果未来十年世界能保持和平，政治环境可能会发生变化，政治领导人在面临生死攸关的全球挑战时将形成合作优先而非冲突优先的思维。

在狭义上，当代中美关系依赖于共同的经济利益，有时也依赖于在面对共同敌人时的一致目标，如冷战时期的苏联以及“9·11”之后的恐怖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地缘战略和多边关系的支柱相对牢固地支撑着两国关系，但现在这些支柱也在出现裂痕。大多数美国人，包括精英，都难以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不熟悉中国文化经典、语言、传统伦理观以及当代共产主义领导层，这可能导致美国人对中国执政党的不确定和不信任。

美国战略界中许多人完全不能接受中国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想法，认为中美必然会发生武装冲突或对抗，问题是何时，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中国战略界也存在类似情况。中美两国无论是在道义层面还是务实层面都应该思考，如何在认识到中美之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的同时，延续和平与繁荣，找到战略出路，或者至少是防护措施。对此，作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提升双向战略素养。双方都必须考虑对方会如何解读自己的行动，至少要留意对方的政治文化、制度和精英会如何解读本国的战略语言、行动和外交信号。

其次，建立中美联合战略框架，努力实现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任务：1) 就双方战略红线问题(台湾问题等)的处理原则和程序达成一致；2) 共同确定全面战略竞争成为新常态的领域，例如外交政策、经济政策、技术发展等；3) 明确存在战略合作的领域，如气候变化领域等。

中美联合战略框架虽然无法完全防止危机、冲突或战争，但能够降低可能性，在发生意外事件时，能够帮助控制或缓和矛盾。

美国外交

美专家：美放弃反卫星武器试验助力太空规范的发展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网站4月20日登载该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安基特·潘达（Ankit Panda）的文章称，美国放弃破坏性反卫星导弹试验有助于促进太空可持续性规范发展。文章摘要如下：

近日，美国决定自愿放弃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武器（DA-ASAT）试验，为促进负责任的太空行为规范开辟了新的途径。尽管当前没有相关国际法律框架明令禁止此类试验，但其他国家应该效仿美国，自愿避免破坏性的 DA-ASAT 试验。DA-ASAT 试验产生的碎片对所有寻求使用近地轨道的国家和航空企业都构成了威胁。鉴于美国的日常现代生活和海外军事活动都有赖于卫星的运行，美国在限制碎片数量方面有着重大利益。

虽然单一国家结束破坏性 DA-ASAT 试验的承诺不会减缓几十年来太空军事化的进程，但美国已通过实际行动为制定太空可持续性规范助力，其他国家的类似声明将有助于确认这一新规范。华盛顿应该把争取支持的重心放在拥有基础技术和潜在专业知识的国家身上。例如，已经进行过相关实验的日本和印度，作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应申明今后不会进行此类试验，并与美国一道支持建立一个国际法律框架，禁止包括 DA-ASAT 试验在内的任何在低地球轨道上蓄意制造碎片的事件。

针对该声明，美国国内批评者认为俄罗斯和中国等拥有 DA-ASAT 武器的大国不太可能跟进这一努力，美国应该对自己的选择持保留态度。然而，批评者的观点可能是被误导的结果，原因有二。第一，这一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策调整的主动选

择。第二，这一声明有助于美国发展其他新式反太空能力。一旦 DA-ASAT 被使用，战争性质将迅速升级，产生不可逆转和无法控制的损害。事实上，俄罗斯和中国对这些武器用途的看法也可能会随着它们发展替代性的反太空能力的进程而改变。

虽然美国与中俄两国在太空武器定性上存在分歧（后两者目前拒绝承认 DA-ASAT 是太空武器），但华盛顿的做法，明确了未来努力的方向，有助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

卡托：美应该支持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

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网站4月18日登载该所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的文章称，战争鹰派无视核威胁，对俄开战的想法是错误的，美国应该支持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普京的军事行动没有道理。然而，美国和欧洲伪善的无辜姿态和道貌岸然的态度令人厌倦。事实上，不管美国及其他北约成员国或欧盟官员做出何种承诺，并没有人真正愿意为乌克兰而战。当然，盟国的背信弃义已经成为过去。如今俄乌正在交战，华盛顿不仅应该支持乌克兰人自卫，更应该支持乌克兰人结束敌对状态，尽早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

战争不是慈善事业，美国避免卷入军事冲突的做法是正确的。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美国人，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领土和繁荣。不幸的是，一些美国官员似乎不愿意接受妥协。相反，他们支持向基辅提供战争工具，支持乌克兰战斗到最后。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美国国会的多名共和党议员就提议“在黑海部署美军以抵御俄罗斯潜在的军事行动”。个别极端议员甚至建议拜登政府不要排除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选项。

然而，鹰派的军事计划会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被用来对付美国军队和本土。考虑到损害如此之大，采取谨慎态度才是正确的应对方式。俄乌冲突不能成为美国宣战的理由。美国公众不会支持战争，或是以此为结果的大国对抗和核冲突。尽管莫斯科也不希望与美国爆发核战争，但作为实力较弱的大国，它有强大的动机拒绝美国的胁迫，并在常规力量处于劣势时寻求核武器。在俄罗斯的利益远大于美国的地方，比如乌克兰，莫斯科有更充分的理由既发出威胁，又采取行动。

对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大力支持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这场冲突的最大受害者是乌克兰人，战斗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就越大。根本而言，美国战争鹰派对于俄罗斯核武器威慑的激进论调既不符合乌克兰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军官：美应调整安全援助方法以实现政策目标

4月19日，美国军事评论网站 War on Rocks 登载美国陆军步兵军官杰里米·格温（Jeremy Gwinn）的文章，详细分析了美国对外安全援助情况，具体内容如下：

“安全援助”通常是指在美国《对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和《武器出口管制法》（Arms Export Control Act）授权下的一套特定援助款项。当安全援助发挥作用时，它能为受援国提供解决内部不稳定以及威慑和防御外部对手的工具，降低未来需要美国直接干预的可能性。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美国每年对外安全援助有极大部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安全援助会产生一个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代理人天生比委托人更了解本土状况，两者之间信息极不对称。代理人作为理性

行为体，在没有其他激励的情况下，会按照有利于自身的原则行事。委托代理中利益的错位程度越大，后续产生的问题就越多。幸运的是，这并非不可逾越的障碍。“胡萝卜加大棒”（carrot-and-stick）是实施安全援助的惯常手段。提供武器、装备或其他形式的安全援助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激励，即“胡萝卜”。相应地，拒绝提供或扣留上述物品便是“大棒”。这种方式最成功的例子是二战后美国援助菲律宾平定虎克军（Hukbalahap）叛乱一事。

然而，使用援助作为激励机制的方法也并非总能奏效。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将安全援助作为诱饵，试图说服南越吴庭艳及其继任者实施政治和军事改革。尽管美国安全援助不断涌入，却仍挽回不了美国及其南越代理人败北的事实。

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的安全援助原则可以总结为优先考虑“建设受援国的能力”，但这一原则存在两个主要缺陷：首先，该原则忽略了受援国潜在的制度性弱点。在此情况下，援助可能会使腐败等内生问题变得更糟。其次，重视能力建设还忽视了上文提到的委托代理问题。美国假定只要对受援国进行了足够多的培训以及完成了相应关系的建立，军队就会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自愿改革。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综上所述，美国目前并没有从对外安全援助中获得最大收益。因此，美国应该给援助附上先决条件，使其成为实现受援国国防机构改革和美国更广泛政策目标的杠杆。对于有条件援助的反对论点主要有二：一是在大国竞争时代，如果美国坚持以有条件的援助换取并不受欢迎的改革，俄罗斯、中国或其他竞争对手或许能轻松填补美国与伙伴国之间的合作缺口；二是在等待改革发生的同时，不能让伙伴国家失去关键能力。美国对外安全援助的目的应该是通过提供更优的激励制度来改变受援国行为，而非威胁

其生存安全。在危机情况下，改革不能等待

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武器和装备是当前美国对外安全援助中最抢眼的例子，但它并不能代表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开展的日常安全援助工作。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伙伴国家面临的更大威胁并非外国军队，而是需要改革但缺乏适当激励的国防机构。改进美国的安全援助方法是创造这种激励并使援助更好地符合政策目标的一种方式。

美国政治/其他

拜登政府移民政策摇摆不定的原因

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网站4月21日登载移民法专家诺兰·拉普波特(Nolan Rappaport)的文章称，拜登移民政策摇摆不定可能是拜登本人缺乏决心以及其政策团队内部意见割裂所致。文章摘要如下：

拜登在竞选总统时曾承诺会扭转特朗普政府的边境政策，但随后却又收回了承诺，因为他担心立即改变前任政府的政策会导致西南边境出现混乱局面。然而，拜登政府近期推行的两项政策却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一是拜登想终止《移民保护协议》¹。协议终止后，可能出现非法移民拘留激增的情况，然而拜登非但没有增加国土安全部的拘留能力，反而计划削弱现有设施中25%左右的拘留容量。二是拜登取消了第42号禁令，新冠肺炎病毒不再成为驱逐非法移民的合法理由，此举恐怕将在边境地区引起移民和毒品海啸。

到目前为止，拜登的边境安全措施严重不足，移民政策混乱

¹ 《移民保护协议》(Migrant Protection Protocols, MPP)，即“留在墨西哥”政策。2019年1月开始执行，该政策要求试图寻求美国庇护的中美洲国家移民停留在墨西哥边境城市，等待美国法院审理庇护申请。

不堪，原因之一是拜登及其高级助手们犹豫不决，缺乏决心，这导致拜登被拉向与初心相反的方向。原因之二是白宫内部存在两个独立阵营，每个阵营都试图操纵移民法。一方是白宫办公厅主任罗恩·克莱恩(Ron Klain)、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高级顾问塞德里克·里士满(Cedric Richmond)和国内政策顾问苏珊·赖斯(Susan Rice)。他们主张采取阻止非法越境的策略。另一方包括总统的许多竞选顾问，他们声称威慑不起作用，希望彻底改革移民系统，创造更多合法的移民途径。

美专家：美应重视高能材料与军火生产

美国《防务快报》(Breaking Defense)网站4月20日登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迪亚·沙德洛(Nadia Schadlow)等人的文章称，美国政府需采取措施保障高能材料的供应链安全，以确保在危机时刻能获得充足军火。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俄乌冲突提醒了世界各国领土的控制仍十分重要，而导弹、火箭和大炮等军火产生的爆炸性力量是控制战场的关键。这些军火的共同点是均依赖高能材料。不幸的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高性能材料方面投资不足，现在正面临着严重的供应链短缺问题。据2018年美国防部的研究显示，中国是美国一些高能材料的唯一来源或主要供应商。少数能在美国本土制造的材料往往使用的是早已过时的，来自20世纪的生产设备。

除了供应链问题，美国在先进的能量材料领域也落后于其他主要对手。目前，俄罗斯和中国都普遍使用CL-20这种世界上最强大的非核炸药。虽然美国科学家早在1980年代就发明了这种炸药，但在官僚主义和冷战后的自满情绪的影响下，美国国防部从未大规模部署CL-20，相反，美国军方仍然依赖于二战期间使用

的材料。鉴于上述情况，如果美国未来不幸被拖入一场持久战中，很快就会发现自已处于劣势。对此，作者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美国防部应该为新化合物提供明确的需求信号，武器研发应该以更远的射程、更快的速度及更大的杀伤力为目标。

第二，美国需要与盟友合作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少数国家的弹性供应链。《国防生产法》（The Defense Production Act）可以为愿意投资这些关键化合物的企业和公司提供贷款。

第三，国会和各部门领导应该增加在高能材料方面的科学技术研发资助，鼓励新化合物的开发，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来驱动新的突破。

参众两院“竞争法案”在关键议题上存在分歧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4月18日登载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文章称，美国会参众两院都通过了有助于美国开展芯片研究和制造的重大立法，但两个法案在关键议题上存在分歧。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法案之间存在共识。参众两院的法案均同意为半导体的研究和生产拨款超520亿美元，联邦政府的赠款和贷款将用于补贴建造或翻新半导体工厂。

其次，法案之间部分重叠议题存在明显的愿景差异。两项法案都授权大幅提高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出额度，但两院对获得资助的研究项目有不同的优先事项。参议院同意在5年内提供290亿美元，专注于加强美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等尖端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而众议院计划在5年内提供133亿美元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问题。此外，这两项法案还要求建立区域技术中心，但拨款数额（参议院版法案

100 亿美元，众议院版法案 70 亿美元）和筹建数量（参议院版法案 20 所，众议院版法案 10 余所）有所不同。

最后，两项法案在某些议题领域存在严重分歧：1) 供应链方面，众议院版法案中包含一项价值 450 亿美元，旨在加强美国供应链的条款，而参议院版法案中没有相关规定；2) 贸易方面，众议院授权一项为因进口增加而失业或工时减少的人提供培训和经济援助的计划，而参议院对此未作规定，而是响应美国商界的需要，将更多产品排除在前任政府征税清单之外；3) 众议院版法案还涉及移民和气候变化等议题，而参议院法案则没有。

皮尤：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影响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4 月 20 日登载该机构高级研究员拉克什·科赫尔（Rakesh Kochhar）等人的报告，详细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不同收入家庭的影响，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疫情成为美国家庭收入增长的转折点。2010 至 2019 年间，美国家庭的收入中值增长了 17%，但疫情减缓了增长势头，导致 2020 年的整体收入一年下降了 2%。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主要由美国中低收入家庭承受。2019 至 2020 年，低收入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中值分别下降了 3% 和 2.1%。相较而言，高收入家庭的财务状况没有受到较大影响。

第二，同大萧条期一样，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失业保险成为失业家庭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总体而言，2020 年的失业率（15.0%）与 2010 年大萧条后的失业率（15.2%）总体持平，但大流行期间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资格有所扩大，这帮助了所有收入阶层的家庭。2020 年收到失业保险金的家庭比例（15.4%）远高

于 2010 年 (9.6%)，其中，中产阶级家庭占 18.0%、低收入家庭占 13%、高收入家庭占 13.1%，这些比率都高于 2010 年。

第三，尽管疫情带来了经济衰退，但处于低、中、高收入家庭的人数比例没有显著变化。2021 年，大约 50% 的美国人处于中等收入家庭，29% 位于低收入家庭，21% 为高收入家庭，数据与 2020 年无异。此外，疫情期间，美国人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流动的幅度与过去大致相同。

《政客》：中期选举的初步预测及五大潜在影响因素

美国《政客》(Politico) 网站 4 月 19 日登载该站首席民调分析师史蒂文·谢泼德 (Steven Shepard) 文章，对 11 月中选之前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原因进行了分析。文章摘要如下：

2022 年大选对于民主党而言一直是一场苦战，目前来看，拜登不断下滑的支持率令他的政党一直忙于挽回由此造成的巨大损失，恐怕难以在 2024 年之前摆脱这一困境。基于此，《政客》对 2022 年中选进行了初步预测——对于民主党人来说，众议院希望渺茫，参议院尚能争取，此外，共和党还准备在州一级的竞选中取得全面胜利。但在选举日之前，政治环境仍可能发生变化，具体来看，可能存在五个未知因素扰乱预测：

第一，初选问题。共和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中均缺乏极具吸引力的候选人，恐怕会在本该取胜的选举中失利。民主党人同样需要担心自身初选问题。该党内部自由派候选人在经历激烈的初选后，任何一方恐怕都难以在 11 月站稳脚跟。

第二，国会地图尚未盖棺定论。目前，虽然共和党控制下的个别州的新国会选区地图尚未最终敲定，但两党都已积极介入到各州针对新选区地图的民权诉讼问题中。若诉讼取胜，将有助于

民主党留在赛场上。

第三，通货膨胀有望好转。扭转当前民主党劣势地位最有效方法是减缓通货膨胀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通胀已经见顶，未来几个月物价增速将放缓。

第四，经济萧条。如果遏制通货膨胀的努力减缓了美国的经济增长或提高了失业率，选民们对政府经济政策的支持可能会下降。悲观情绪的放大可能导致民主党人进一步遭受损失。

第五，堕胎问题。预计今年6月或7月，最高法院将对一个涉及大幅削弱堕胎权的案件做出裁决。虽然尚不清楚它将如何影响中选，但这一议题会让人们更多地关注共和党重视的州际选举。

美专家：共和党在中选期间专注于文化战争的原因

近日，美国《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 政治专栏作家艾德·祁戈 (Ed Kilgore) 在该杂志旗下网站 *Intelligencer* 上撰文，对共和党当前的中选表现进行了详细分析，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共和党人拥有将中期选举简单化的所有有利要素：一个不受欢迎的总统，一个令人沮丧的民主党基础，以及一个对民主党而言棘手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从历史经验来看，共和党正走向胜利，包括赢回众议院（这将终结民主党的三连胜战绩）以及在州一级有所斩获。在此背景下，共和党最智慧的中期竞选方式往往遵循最简单的道理——顺势而为，不要采取其他任何有机会把选举变成总统公投以外的事情。

然而，共和党人截至目前的竞选行动总体来看并没有遵循上述法则。相反，在极大程度上，共和党候选人和当选官员正全情投入到文化战争的话题当中。他们在积极推动全面

禁止堕胎，对打击犯罪提出法律和秩序要求，抨击公立学校在性别、性取向和种族问题上对学生进行的所谓“觉醒教化”（woke indoctrination）。具体来看，导致了共和党人中期选举战略失控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保守的基督教阵营要求进行文化战争。共和党政客们挑起文化战争最根源且最浅显的原因在于，其政党基础的主导势力是保守的基督教徒，比起其他任何政治议题，基督徒们更关心所谓的传统价值观的退化。考虑到选举投票率的重要性，共和党人并不希望采取任何可能打击选民热情的行动，即使这种热情主要来自于难以满足的对神权的渴望。

第二、更新、更流行的文化战争问题正在出现。即使许多保守派选民的主要动机仍然基于传统的福音派或天主教的宗教观点，以及对现代先进文化的排斥，但右翼文化主导的旧政治结构中也出现了新的裂痕，即跨性别权利（transgender rights）。它的出现为宗教右翼针对公共教育由来已久的、基于宗教的敌意，提供了新的能量，矛盾日益激化。

第三、保守派试图改变当前的社会文化。当前右翼发起文化战争的能量多来自于保守派已经享有权力的地方，尤其是在红色和深红管辖区的州立法机构。对这些人来说，2022年的中期选举是凭借文化保守的方式积极参与治理的机会。共和党人正在借着这个势头做自身以及其选民想完成的事情，即将当前无神和无序的文化重新引导回传统道路上。

如果共和党人未能在11月中期选举中取胜，那这段时间以来的文化战争或许会消散。但对美国而言更糟糕的是，当共和党人在选举中失利时，特朗普主义会推动他们加倍努力打击极端主义。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